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历史沿革

赵灿鹏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暨南大学; 南洋文化事业部; 东南亚研究; 华侨华人研究

[摘要] 1927年诞生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 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绩最多、声名最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 它开辟了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关于这一机构的历史沿革, 已有的叙述或有讹误与疏略之处。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 提出较为清楚准确的表述, 以供学者了解暨大校情以及进行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史回顾时参考。

[中图分类号] G64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7)06-0005-08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Bureau for Nanyang Cultural Activities of Jinan University

Zhao Canpeng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Jinan University, the Bureau for Nanyang Cultural Activitie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27, the Bureau for Nanyang Cultural Activities of Jinan University was the biggest and longest-standing institu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China. It got great achievements and fame, and thus started a new era of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The previous narr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 included many contradictory elements. 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topic, and offers a rather accurate statement, which would be a substantial reference to the scholars who intend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Jinan University, or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1927年9月21日诞生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 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绩最多、声名最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 至1951年暨南大学暂时停办时中止, 它以24年长期持续的努力, 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久远的社会与学术影响。已故东南亚华侨史家姚楠先生, 晚年总结中国20世纪的东南亚华侨研究史, 认为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设立, 是“标志着华侨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事件”, 它“开辟了华侨史研究的一个历史时期”^[1]。另一位著名的东南亚

史家王赓武先生也说: “……1928年(应为1927年——笔者注)上海暨南大学成立南洋研究所(译者按: 原名为南洋文化教育事务部), 并出版刊物《南洋研究》, 乃是促使中国政府更积极地卷入东南亚事务的这个强大的运动的最高潮。”^[2]据此, 我们借用1920年代人们使用的语汇, 说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 开辟了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纪元”¹, 似乎并不为过。

关于这一机构的历史, 除暨南大学各版校史中

* [收稿日期] 2007-10-16

[作者简介] 赵灿鹏, 博士,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系暨南大学人文社科引进人才项目“海外华人历史文献综论”(批准号: 006JSYJ006)成果之一。

¹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的《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1929年, 第2-3页)说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创立, 是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改组创校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可以说暨南大学开一‘新纪元’”; 该部秘书钱鹤在《策进南洋文化事业之两大问题》(《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二号, 1928年8月15日, 第8页)一文中说, 希望郑洪年校长“能坐言起行……以开侨务之新纪元”。又1929年4月1日, 钱鹤在暨南大学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归国代表谈话会上说: “……郑校长……接办暨南……创设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这一点对南洋方面能开一新纪元。”(《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代表谈话会》, 《南洋研究》第二卷第六号, 1929年6月30日, 第241页)

相关部分之外^[3]，罗晃潮、沈立新、张央、李洁容等先生女士曾撰有专论¹，使我们对于该机构的基本情形与发展线索，有一个较为清楚简明的认识。虽然如此，前贤的论述或有讹误与疏略之处，笔者不揣固陋，草成《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史稿》一书，以供学者了解暨大校情、进行东南亚与华侨研究学术史回顾时的参考。兹先将关于“历史沿革”部分发表，因所见资料有限，笔者的认识必多错误，恳请校内外师友教正。

一 名称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名称，几经变迁，情形略见下表：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沿革表

	成立时间	名称
1	1927年 9月 21日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2	1928年 9月	南洋文化事业部
3	1929年夏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4	1932年 3月	南洋研究委员会
5	1932年 9月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6	1934年 4月	海外文化事业部
7	1939年秋—1951年 3月	南洋研究馆

南洋文化事业部前后共有 6 种不同的名称，使用时间长短不一：“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1 年）、“南洋文化事业部”（约 1 年）、“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4 年半）、“南洋研究委员会”（半

年）、“海外文化事业部”（约 5 年半）、“南洋研究馆”（11 年半），其中以“南洋研究馆”一名时间最长，达 10 余年之久^④。名称虽有变化，但机构本身，前后一脉相承，则为不争的事实^⑤。

在这 6 种名称中，“南洋文化事业部”虽然仅使用过约 1 年的时间，却是最通用的名称。早在 1928 年 9 月之前，该部名称为“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时，暨大校内人士已多以“南洋文化事业部”一名称之^⑥；1930 年代，该部改称“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后，暨大校内仍有称之为“南洋文化事业部”者^⑦；1940 年代，时人追溯该部初期史事，亦称为“南洋文化事业部”^⑧。下至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的翟俊千（1891—1990 年）以及该部成员费哲民（1893—1978 年）、姚楠（1912—1996 年）、苏乾英（1910—1996 年），晚年回忆该部历史，都以“南洋文化事业部”称之^[4]。可证“南洋文化事业部”一名，为该部最一般的通称。下文除了需要特别表明机构沿革的部分，多使用“南洋文化事业部”之名，作为该部的称谓。

二 创立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创立，是以先前暨南学校的研究成绩、组织酝酿与人员储备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1918 年 3 月，暨南学校编辑出版《中国与南洋》（China and Malaysia）杂志，揭开了暨南大学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序幕，也是中

¹ 罗晃潮：《刘土木与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暨南校史资料选辑》，1983 年，第一辑，第 169—185 页；沈立新：《原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介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54—57 页；张央：《南洋文化事业部始末》，《侨史资料》1988 年总 7 期，第 6—9 页；李洁容：《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历史成就与贡献》，《暨南学报》（哲社科版）2001 年第 5 期，第 110—116、140 页。

^④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年，第 346 页）有“南洋文化事业部”、“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南洋研究馆”等 3 个条目，体例似有不纯粹之嫌。最好的办法是以“南洋文化事业部”一条统括全部，如需逐一列举，则缺少“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南洋研究委员会”、“海外文化事业部”等 3 个条目。

^⑤ 1947 年 1 月 9 日，南洋研究馆职员尹育民，向暨南大学校长室报告该馆办理经过情形时说：“……南洋研究馆前身，于廿四年名海外文化事业部，廿三年曰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民国十七年初成立时，则曰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名称因人、因时不同，或曰部，或称馆，亦係命名者自己心理上之区别。正如酒係一样，酒装在方瓶、圆瓶内，外表看去有些异样耳。”（“国立暨南大学关于南洋研究馆改名为南洋研究所事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635 第 127—130 页。）此语可以代表该部中人的意见。本文作者按：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于 1927 年 9 月，并非“民国十七年初”，此处系尹氏误记。

^⑥ 《职员一览表·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表》（《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国立暨南大学，1927 年，第 11—12 页）记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职员，教育股主任徐中舒等五人，职务皆以“南洋文化事业部”名称冠首；又《洪年图书馆日记》（《暨南周刊》第二卷第六期，1928 年 4 月 2 日，第 41 页）；3 月 19 日，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收《南洋文化事业部宣言》二十册”。按：该宣言原名为《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宣言》（《南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28 年 4 月，第 119—124 页）。《国立暨南大学十六年度下学期第七次纪念周》（《暨南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8 年 4 月 9 日，第 71 页，校长郑洪年报告）：“……调李（继膺）至南洋文化事业部担任编辑。”《洪年图书馆日记》（《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二期，1928 年 6 月 4 日，第 124 页）；5 月 22 日，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通知南洋文化事业部及出版课，即将本校刊物邮寄《大光报》馆。”

^⑦ 例如《二十二年度第五次校务会议记录》（《暨南校刊》第八十五期，1933 年 12 月 11 日，第 6 页）：“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刘土木先生来函请假三月……”

^⑧ 钱西园编《（顾因明先生）年谱》（《南洋文化》第一卷第一期，1941 年 6 月，第 89 页）：“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时刘土木主持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按：钱鹤，号西园，1928 年 2 月至 1931 年 2 月任职于该部（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第 9 页；陈福璋编《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一号，1931 年 9 月 1 日，第 169 页）；刘土木于 1928 年 6 月被聘为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校长布告（第九十一号）》，《暨南周刊》第三卷第六期，1928 年 7 月 2 日，第 70—71 页）；1940 年代，该部已改名“南洋研究馆”。

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开端之一¹。就组织方面来说,早在1921年,暨南学校已有在师范科设立海外研究部的意向,后因故未果⁵。1927年5月,暨南学校校长姜琦拟订《国立暨南学校改革计划意见书》,其中提出设立研究部的设想。该部的宗旨与功能,与数月之后诞生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如出一辙,这是南洋文化事业部历史上不应被忘却的一页⁴。

1927年6月14日,暨南学校校长郑洪年莅校就职⁴。他履任之初,即积极主持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大学。6月27日,郑氏发表暨南大学改组计划大纲⁶,其中明确提出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计划:

……此外更当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期与南洋华侨各种教育机关联为有系统的组织,以统一南洋所有文化教育事业。并调查南洋各属华侨的生活,以为将来设施扩充的根据,且一方面使国人明瞭华侨在南洋之现状,以促成国人向海外发展的企图;一方面使华侨明了祖国之现状,以造成华侨参加祖国一切运动的机会,此皆暨南职责所在,义无旁贷者也⁷。

在组织大纲中,暨南大学设置大学部、中学部与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三者鼎足而立,该部在校内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见⁴。

9月5日,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正式就职⁸。9月21日,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正式宣告成立⁹。该部下设教育、调查、指导、宣传、编译等五股,分股办事,各股职责如次¹⁰:

- (1) 教育股 “办理关于辅助南洋华侨教育事宜”;
- (2) 调查股: “调查南洋文化教育一切事宜”;
- (3) 指导股: “指导南洋华侨一切改进事宜及南洋各种问题之研究”;
- (4) 宣传股 “办理本国与南洋之各种宣传事宜”;
- (5) 编译股: “办理本部出版事业”。

各股负责人分别为:教育股主任徐中舒,调查股主任刘南风,指导股主任章铁民,宣传股主任章衣萍,编译股主任王名烈¹¹。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设立委员会总揽部务,校长郑洪年任委员长,“负责对内对外一切责任”¹²。委员名额则有异说,1929年编印的《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说委员有十七人^{1/2},1931年编印的《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说委员有十六人^{1/4},二说难以遽断正误,存疑待考。

委员名录亦有以下四种不同版本:

甲、1928年1月14日出版的《暨南周刊》“寒假特刊”,载有黄振汉《改组后的国立暨南大学》一文,中有“职员一览表”,表中所列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委员人名,依次为黄建中等十六人¹³。

¹ 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刊物,据笔者见闻所及,时间最早应数1910年6月,旅日中国学者李文权(1878—?年)在东京组织“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刊行《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参见李文权:《三十七年自述》《中国实业杂志》第六年第九、十期合卷,1915年10月1日,第597页;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14页)。中国国内则以1912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华侨联合会,于1913年11月创办《华侨杂志》(The Chinese Overseas Magazine)为最先,惟于次年1月出版第3期后即停刊(《华侨杂志》第一期,1913年11月;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812页);其次即1918年3月暨南学校编辑《中国与南洋》杂志,至1922年5月停刊,前后共出版3卷25期。1928年10月21日,菲律宾华侨颜文初致书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说:“……就出版物论,除民元时华侨联合会有《华侨杂志》(至第三期而止),与贵校昔时《中国与南洋》出版外,皆不多见。”(《菲律宾颜文初先生致本部同人书》《南洋研究》第二卷第四号,1928年10月15日,第172页,出版日期据版权页所署,实则该期至12月才印出。)

⁴ 姜琦:《国立暨南学校改革计划意见书》,国立暨南学校,1927年,第38—42页。又同年7月,暨南学校教员刘南风,提出设立“南洋学院”的构想(刘南风:《南洋学院建议》《暨南半月刊》第四十八期“暨南建设号”,1927年7月30日,第22—24页),皆可表明南洋文化事业部创立前夕,暨南学人中普遍的想法。关于南洋文化事业部创立的动机、缘由与背景,详参赵灿鹏有关论著。

⁴ 《民国十七年度大事月表》(《国立暨南大学校务特刊(十六年度)》,国立暨南大学,1928年9月,第24页)说:“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三日,郑洪年校长奉国民政府命蒞校接收。”但郑氏于1928年2月8日暨大开学仪式上致词说:“前学期我是六月十四日到校的……”(《开学记事》,《暨南周刊》开学号,1928年2月18日,第2页;郑洪年:《暨大校务的改进》,李邦栋编《郑洪年教育言论集》,第一集,国立暨南大学,1929年,第8页。)郑氏《一年来之经过并今后之计划》(李邦栋编《郑洪年教育言论集》,第一集,第11页):“洪年自去年六月十四日受命中央,接长暨南以来……”又1929年4月1日,暨南大学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归国代表谈话会上,会议筹委、南洋文化事业部秘书钱鹤说:“……郑校长在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四日接办暨南……”(《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代表谈话会》《南洋研究》第二卷第六号,1929年6月30日,第241页。)且6月14日为民国时期暨大校庆日,故以郑氏自述日期为确。

⁴ 《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第1页。不过,南洋文化事业部的这种特殊地位,至1930年代已经发生改变。比如在1933年的暨大组织架构中,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已经“降格”为“特种组织”之一,与各种委员会并列(《组织大纲》,《国立暨南大学法规集》,国立暨南大学,1933年,第8页)。

⁴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第8—9页):“本部职员,最初有黄建中、夏巧尊、汪奠基、徐中舒、林思温、刘南风、余佑人等十七人当委员。”

⁴ 陈福培编《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一号,1931年9月1日,第169页):“民国十六年十月,本部创设之始,采用委员制。郑校长兼任委员长,聘本校大学部教务主任黄建中、中国文学系主任夏巧尊、教育学系主任汪奠基,教授郑宝照,及本校教职员徐中舒、刘南风、章铁民、章衣萍、王名烈、林思温、汤文聪、蔡和钦、邬翰芳、余佑人、龚业光、杨昭愆十六人为委员……”按:“杨昭愆”之“愆”字,原文误作“化”,径改。

乙、1928年 4月出版的《南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载有《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宣言》文后署名有委员叶崇智等十二人^[14]。

丙、1929年编印的《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说委员有十七人，列举黄建中等七人^[15]。

丁、1931年编印的《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称委员有黄建中等十六人^[16]。

四种名录内容互有参差，为简明起见，特制作对照表如次：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委员名录对照表

序号	人名（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名录甲	名录乙	名录丙	名录丁
1	蔡和钦	☆	☆		☆
2	龚业光	☆			☆
3	黄建中	☆		☆	☆
4	林思温	☆	☆	☆	☆
5	刘南风			☆	☆
6	刘士木	☆	☆		
7	汤文聪	☆	☆		☆
8	汪奠基			☆	☆
9	王名烈	☆	☆		☆
10	邬翰芳				☆
11	夏丐尊	☆		☆	☆
12	谢循初	☆	☆		
13	徐中舒	☆	☆	☆	☆
14	杨昭愬	☆	☆		☆
15	叶崇智	☆	☆		
16	余佑人	☆	☆	☆	☆
17	章铁民				☆
18	章衣萍	☆	☆		☆
19	郑宝照	☆	☆		☆

以上四种名录，甲、丁两种较为完整，其中甲

种时代最早，故最可信据，但所阙刘南风、邬翰芳、章铁民三人，当时分别担任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调查股主任、指导股助理、指导股主任之职^[17]。据《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第五条，以各股主任、助理充任委员会常务委员^[18]，因而三人都应该在委员之列¹。是则委员数目计得蔡和钦、龚业光、黄建中、林思温、刘南风、刘士木、汤文聪、汪奠基、王名烈、邬翰芳、夏丐尊、谢循初、徐中舒、杨昭愬、叶崇智、余佑人、章铁民、章衣萍、郑宝照等十九人，但委员名额只有十七名或十六名，可以推断此十九名委员并非同时在任，前后应有更替。

同时，教育股主任徐中舒，兼任该部主任秘书，具体主持部务^④。

三 沿革

1928年 2月，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修改组织条例，分设文化、教育两股以及编译委员会，“文化股办理关于促进南洋华侨文化事宜，教育股办理关于辅助南洋华侨教育事宜，编译委员会办理本部编译出版事宜”^[19]。聘刘士木任文化股主任，徐中舒任教育股主任，前任委员都去职^⑤。同年 6月 23日，聘刘士木任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20]。

1928年 9月，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更名为南洋文化事业部^⑥，下设事务、编译、调查、宣传四股^⑦。次年 1月，南洋文化事业部修改组织条例，分设总务、编译两科，总务科下设庶务、宣传、调查、交际股，编译科下分月刊、丛书、通讯股^⑧。

1929年夏，南洋文化事业部改组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下设总务、编译二股^[21]，后改设调查、编辑两股^[22]。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时

¹ 《教职员一览表》（《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第 11—12页）明言邬翰芳为“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委员兼指导股助理”。

^④ 《民国十七年度大事月表》（《国立暨南大学校务特刊（十六年度）》，第 31页）：1927年 11月 29日，“聘徐中舒先生任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秘书”。但此处疑有讹误，因 10月 29日该部举行的茶话会上，徐氏已经以主任秘书的身份报告该部经过情形，并代表校长郑洪年担任会议主席（《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招待本校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团体代表纪事》，《南洋研究》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 1月 5日，第 147页）。按：徐氏曾协助校长郑洪年起草暨南大学改组计划书与组织大纲（《国立暨南大学十六年度下学期第七次纪念周》，《暨南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8年 4月 9日，第 69页、校长郑洪年报告），为郑氏在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最为倚重的人物之一。

^⑤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第 9页。张晓辉主编《百年暨南史（1906—2006）》（第 50页）说教育股主任为刘南风，疑误。

^⑥ 陈福璋编《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一号，1931年 9月 1日，第 168页）：“十七年九月，部内同人，以本部创立，尚在缔造之时期，一切设施，当循序渐进，乃裁教育于文化，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按：“尚”字原作“当”，疑误，据文义改。陈氏报告（第 169页）又说：“十七年七月，部制复改，并教育于文化，改‘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为‘南洋文化事业部’，时间稍有差异。”

^⑦ 《华侨消息·国立暨南大学之近况》（《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二号，1928年 8月 15日，第 117页）：“最可令人注意者，暨大特设南洋文化事业部，专负研究指导南洋文化事业之责，原分文化、教育两股，今已改分事务、编译、调查、宣传四股……”

^⑧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第 7—8页。《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 164页，原载《一九二九年暨南年鉴》）：“十八年二月起，本部组织条例，又略有变更，分设事务和编译两股……”记述稍异。

间,过去学者都认为是1930年9月¹,此说有误。暨大校长郑洪年撰《民国十八年之暨南大学》一文说:“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以来,已经二年。今年夏间,再扩充为南洋美洲文化教育事业部。”^[23]明言此为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之事。1929年4月2日公布的《国立暨南大学组织专章》,第一章第一条说:“本校分下列各部:一、大学部;二、中学部;三、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④无名氏于1929年4月18日所撰《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一文也说:“……本部新改名称叫‘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现在因经费和人才关系,还是把南洋做范围,没有扩充到美洲哩。”^[24]1929年10月27日,该部致暨大病逝学生周劭钧追悼大会挽联,落款亦已署称“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25]。1929年11月3日,该部秘书钱鹤,于中央训练部举办华侨教育会议演讲“华侨教育问题”,也说:“暨大所设之南洋文化事业部,近亦改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推广范围,扩大组织。”^[26]1929年11月7日出版的《暨南校刊》第十七期,有《南洋文化事业部最近工作》一文,说:“……南洋文化事业部,今已扩大范围,改为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27]又1929年11月28日出版的《暨南校刊》第廿三期,录有《本校组织与教职员姓名》,其二“职员之部”之丙,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职员名录^[28]。凡此足证1930年说为误。

1932年1月,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暨南大学校舍位于战区,学校本部被迫迁至上海赫德路。3月,因战时经费紧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

部暂时撤消,同时撤消的并有商学院南洋商业调查部,另外组织南洋研究委员会,聘陈钟凡、于基泰、孙寒冰、谢循初、叶渊、樊守执、杨裕芬、刘士木、褚凤仪、刘世芳、蔡正雅、丘汉平、林有壬、陈希文等十四人为委员,褚凤仪、刘士木、杨裕芬等三人为常务委员^[29];4月,刘士木兼任该会编辑股主任,褚凤仪兼任调查股主任^[30]。7月15日,聘刘士木、魏振华、陈希文、林有壬、褚凤仪、汤文聪、陈其英、蔡正雅、杨裕芬等九人为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刘士木为主席委员兼调查股主任,陈希文为副主席委员兼编辑股主任,魏振华为常务委员兼秘书^④。9月,暨南大学于战后迁回真茹校址,南洋研究委员会撤销,恢复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④,组织仍沿用委员制^④。1933年2月,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取消委员制,恢复部主任制,主持人员仍旧^[31]。11月3日,该部主任刘士木因母丧请假,主任职务由副主任陈希文代理^[32];12月2日,以该部主任刘士木续请长假之故,聘陈希文任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主任^[33]。是年,暨大校长郑洪年拟将该部改为研究所,后因故未果^④。

1934年1月23日,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辞职,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因为校内风潮的影响^④,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职员大多去职^④。2月5日,聘丘汉平任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主任,俞君适任副主任,朱伟文任编辑股主任,邱致中任研究股主任,谢怀清任调查股主任^[34]。4月,南洋美洲

¹ 陈福璿编《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一号,1931年9月1日,第169页):“十九年九月,校长以本部二年来之努力,成绩斐然,乃扩大本部之范围,兼及美洲之研究,旋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此说为各版校史沿袭(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印《暨南校史(1906—1986)》,第41页;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暨南校史(1906—1996)》,第38页;张晓辉主编《百年暨南史(1906—2006)》,第51页)。

^④ 《校长布告第一五七号》,《暨南周刊》第五卷第七期(1929年5月6日),第1页。按:部名原为“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后省“及”字。

^④ 《校长布告(第十号)》,《暨南校刊》第廿四期(1931年8月1日),第3页。《本会概况》(《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7月1日,第119页)记“现任职员”,有常务委员陈希文、魏振华、刘士木等三人,委员有陈钟凡、于基泰、孙寒冰、谢循初、叶渊、樊守执、杨裕芬、褚凤仪、陈其英、蔡正雅、刘世芳、丘汉平、林有壬等十三人,稍有出入。

^④ 《国立暨南大学董事会议事日程·报告事项·战后整理经过及本年迁回真茹开学情形》(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82,第79页下):“本季开学,……一切组织,恢复‘一二·八’以前状况。……南洋研究委员会,则恢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④ 《暨大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一年来概况》(《南洋情报》第二卷第三期,1933年6月1日,第121页)记是时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委员名录,与当年7月所聘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录,数目皆为九人,差异在以王维骥代杨裕芬。

^④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本学期第一次部务会议纪录》(《暨南校刊》第五十七期,1933年3月27日,第4-5页,暨大秘书长杨裕芬报告,按:题目“录”字原阙,据文义补):“下学年校长拟将本部改为研究所,与本校教务相联络,俾全校员生共同研究侨教文化问题。”

^④ 自1933年12月起,暨大校内发生严重学潮,致使校长郑洪年被迫辞职,同时有大批教授与行政职员去职。这次变故出于非常,当时校中人士多以“不幸事件”称之。即使在沈鹏飞代任校长之后,暨大学潮仍然余波未歇,直至1935年7月,沈氏辞职,何炳松继任校长之后,才最终平静下来。1934年前后暨南大学的风潮,是民国时期政治派系势力在教育领域延伸的一个显著案例,其中有诸多未解之谜,亟待深入探讨(参见赵灿鹏《江应樑先生早期佚文一束——暨南大学校史文献披览所见》,《西南古籍研究(2007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即刊)。

^④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近况》(《暨南校刊》第九十期,1934年3月12日,第7页):“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前以风潮影响,职员星散,工作进行,久告停顿。”

文化事业部改名为海外文化事业部¹。1935年5月15日,该部主任丘汉平辞职,改聘原文学院院长孟寿椿为该部主任^[35]。

1935年7月,教育部任命何炳松为暨南大学校长,暨大代理校长沈鹏飞辞职^[36]。8月17日,聘吴泽霖任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37];9月10日,聘林仲达任海外文化事业部研究股主任,彭胜天任调查股主任,俞君适任编辑股主任^[38]。1936年3月,聘请陈果夫、孙哲生、陈立夫、萧吉珊、陈树人、林文庆、李登辉、黎照寰、钟荣光、程天放、周启刚等十一人为海外文化事业部顾问,温雄飞、刘士木、李长傅、陈春圃、陈其英、林幽、吴景超、陈达、黄建中、陈里特、罗香林等十一人为海外文化事业部评议会评议员^④。8月,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吴泽霖调任暨南大学教务长,该部主任职务由编辑股主任俞君适兼代^[39]。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暨南大学校址沦为战区,校部迁入上海租界。因战事关系,海外文化事业部暂时停办^⑤。

1938年12月,暨南大学拟议组织南洋研究馆筹备处^⑥。1939年春,南洋研究馆筹备处成立^[40]。当年秋,正式成立南洋研究馆,教务长周予同兼任该馆主任,下设研究、联络二组,该馆主任周予同兼任研究组主任,彭胜天任联络组主任^[41]。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暨南大学停课^[42]。1942年6月,暨南大学迁至福建建阳,南洋研究馆主任周予同留沪

未随校迁闽^⑦。1943年1月,南洋研究馆恢复,聘王勤培为该馆主任^[43]。1945年抗战胜利后,校长何炳松拟订暨大发展计划,包括扩大南洋研究馆,设立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等方案,后因调任英士大学校长,旋即逝世,而未能实现^[44]。

1946年6月,暨南大学迁回上海,校长何炳松去职,李寿雍继任暨大校长。同年12月9日,暨南大学呈文教育部,请将南洋研究馆改设为南洋研究所;经多次公文往返,至次年11月29日,教育部批复南洋研究馆照旧设置,不准改办南洋研究所^[45]。1948年,聘黄如今任南洋研究馆主任^⑧。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4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暨南大学^[46]。7月中旬,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李正文任主任委员,不久离职,由王延青任代理主任委员^[47]。8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暨南大学恢复为华侨高级学府,文、法、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理学院数理、化学两系并入交通大学,地理系并入南京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48]。

1949年9月,院系合并任务完成,教育部规划筹建新暨大^[49]。1950年10月-11月,南洋研究馆职员尹育民清点移交馆藏文物^⑨。1951年3月16日,中央侨委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暨南大学问题座谈会,决定暨南大学暂时停办,燕京大学停止招生,拟将燕京大学改名为暨南大学,兴办华侨教育^[50]。

¹ 《二十二年度第二学期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第三次部务会议录》,《暨南校刊》第九十四期(1934年4月15日),第6页;《本部新闻》,《中南情报》第二期(1934年5月1日),第81-82页;“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致代理校长沈鹏飞函”,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35第12页;“秘书处致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函”,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35第10页。改名原因,以“海外文化事业部致秘书处函”(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35第19-21页)说得最为明白:“属部所研究问题,其范围不仅限于南洋、美洲一带,凡华侨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在研究探讨之列,原名‘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不独含义过狭,未能名副其实,且似嫌累赘冗长,经于第三次部务会议,议决改为‘国立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

^④ 《海外文化事业部二十四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部务会议纪录》,《暨南校刊》第一六四号(1936年3月16日),第6页;“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纪录”,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第45页下;“海外文化事业部评议会委员”,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35第81-82页。按:海外文化事业部顾问名录,该部部务会议提出萧吉珊等八人,大学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增加陈果夫、孙哲生、陈立夫等三人;评议会评议员名录,该部部务会议(2月27日)、大学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3月13日)所提,与“海外文化事业部评议会委员”皆为十一人,差异在后者以罗香林代替黄素封,该名录为暨南大学致海外文化事业部评议会评议员函稿(3月20日发)附件,时间最晚,故据以为正。

^⑤ 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正中书局,1942年,第61页。《南洋研究馆要闻·南洋研究馆正式成立》(《暨大要闻》海外版第二期,1940年2月1日,第7页):“本校原有海外文化事业部,自廿六年战后即行停顿。”

^⑥ “第一一五次行政会议纪录”,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3第51页。按:原文误作南洋研究所。部名由海外文化事业部改称南洋研究馆,原因在于:“……抗战军兴,材料搜集不易,乃于廿八年缩小编制,定为现名(笔者按:指南洋研究馆)。”(“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致教育部呈文稿”,1947年2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35第124-126页。)

^⑦ 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3页):“暨大迁往福建建阳去了……周予同先生因女病重亦未成行。”

^⑧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暨南校史(1906-1996)》,第325页;“国立暨南大学调查概况”(1949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6第4页):“原有组织系统及负责人:南洋研究馆,黄如今。”

^⑨ 尹育民:“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5第33页;“国立暨南大学通知稿”,1950年11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5第31页;“国立暨南大学秘书处通报稿”,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5第32页。按:尹育民负责南洋研究馆文物标本、图书资料的清理安置工作,自1949年4月已经开始(尹育民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5第38页;“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研究馆移交清册”,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225第39页)。

1951年7月,原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王延青与部分留校人员,携带暨大文件档案、日文书刊及有关南洋研究资料,调入燕京大学,担任华侨学生先修班主任,兼燕大教务长^[51]。1952年,燕京大学取消文、理、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改名暨南大学之议中辍¹。

南洋研究馆的学术活动,在1949年5月上海

解放以后,实际上已经中断,但该机构并未取消^④;随后的文物、标本与图书资料清点交接工作,一直延续到1950年底,故该机构存在的年代下限,似以1951年3月,中央侨委会和教育部决定暨南大学暂时停办之时较为合适。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历史至此中止,自1927年9月起,共计存在24年。

【注 释】

[1] 姚楠:《浅谈我国对华侨史的研究》,郑民等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年,第5、12页。

[2] 王赓武:《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姚楠编译《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236页。

[3]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印《暨南校史(1906—1986)》,暨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二章第二、三节;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暨南校史(1906—1996)》,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第二、三节;张晓辉主编《百年暨南史(1906—2006)》,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第二、三节。

[4] 翟俊千:《暨南大学创办初期点滴回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9辑“教科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费哲民:《费哲民自传》,海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编印《海宁人物资料》,第一辑,1986年,第185—186页;姚楠:《对20世纪中国研究东南亚史与海外华人史的情况介绍和几点看法》,宗廷虎编《名家论学 郑子瑜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8页;苏乾英:《回忆何校长二三事》,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5] 《民国十年度暨校预算计划说明书摘要(呈教育部分文)》,《中国与南洋》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1921年11月),第9—10页。

[6] 《民国十七年度大事月表》,《国立暨南大学校务

特刊(十六年度)》,国立暨南大学,1928年9月,第24页。

[7] 郑洪年:《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国立暨南大学,1927年,第1—2页。

[8] 《校长正式就职纪事》,《暨南周刊》第一期(1927年10月8日),第5—9页。

[9]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记录·第一次部会议》,《暨南周刊》第二期(1927年10月15日),第31页。

[10]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暨南周刊》第三期(1927年10月22日),第3页。

[11] 《职教员一览表》,《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第11—12页。

[12]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暨南周刊》第三期(1927年10月22日),第3页。

[13] 黄振汉:《改组后的国立暨南大学》,《暨南周刊》寒假特刊(1928年1月14日),第16—24页。

[14]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宣言》,《南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4月),第124页。

[15]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1928—1929)》,第8—9页。

[16] 陈福璿编《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三年来总报告》,《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一号(1931年9月1日),第169页。

[17] 《职教员一览表》,《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第11—12页。

[18]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暨南周刊》

¹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1、455、457—460页。王延青:《征程》(第338—339页):“当时我和领导华侨教育的韦副部长研究,认为侨生不重视政治的学习,燕京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大学的司令部,是培养高等华人的贵族人材,将来在此办暨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政治上不合祖国建设的要求,而且北京大学校舍陈旧破烂,不如把燕大合并北大,以燕大校舍为北大的校舍,侨生多为广东人或福建人,将来暨南大学不设在广州,就设在福建较好。”

^④ “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大纲(草案)”第四章第十八条:“本大学设图书馆及南洋研究馆,馆长各一人,由校委会推定之。”(上海市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Q240-1-682第3页上。)该文未署名年月,按第一章第一条说“国立暨南大学遵照新民主主义文教政策……”(第2页上),第七章第廿六条说“本大纲由校委会通过后,呈请上海市军管会核准施行……”(第3页下),可知此为1949年7月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制订。约在1950年,暨大整顿期间,曾有建立研究部的设想:“研究部——着重南洋情况的专门研究,招收对华侨问题有相当研究并愿献身华侨事业者,从事研究工作。此项研究生不限于华侨子弟,凡在大学肄业二年以上,或本校师范科与财经科毕业生,均得报考本部,研究年限不定。”(“国立暨南大学之编制及课程内容”,广东省档案馆藏,国立暨南大学档案88-1-40,该卷未署名年月,然以“国立”二字冠首,可知并非1958年后于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卷内师范科社会组选修课程有“马列主义名著选读”、“毛泽东思想方法研究”等科目,故推断为1950年前后暨大整改时期印刷品;又同一卷宗中有“国立暨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人数统计表”,首页注有“1950年报华东教育部”字样,亦可为旁证。)该研究部“着重南洋情况的专门研究”,关注华侨问题、华侨事业方面,同时进行研究生培养,显然为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延续与扩大,但因1951年暨南大学停办,该计划未实现。

第三期 (1927年10月22日), 第3页。

[19]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报告 (1928—1929)》, 第7页。

[20] 《民国十七年度大事月表》, 《国立暨南大学校务特刊 (十六年度)》, 第46页。

[21] 《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大纲》, 国立暨南大学编印《国立暨南大学一览 (十九年度)》, 1930年, 第4—6页;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办事细则》, 出处同, 第75页。

[22]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规程》, 国立暨南大学教务处出版课编印《国立暨南大学法规集》, 1933年, 第57—58页。

[23] 《暨南校刊》, 第卅三至卅六期合刊 (1930年1月23日), 第24页。

[24]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暨南校史资料选辑》, 1983年, 第一辑, 第163页, 原载《一九二九年暨南年鉴》。

[25] 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辛未级周君勛钧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印《周君勳钧纪念册》, 1930年, 第157页。

[26] 钱鹤:《华侨教育问题》, 《暨南校刊》第廿三期 (1929年11月28日), 第17页。

[27] 《南洋文化事业部最近工作》, 《暨南校刊》第十七期 (1929年11月7日), 第13页。

[28] 《本校组织与教职员姓名》, 《暨南校刊》第廿三期 (1929年11月28日), 第4页。

[29] 《第三次特别校务会议纪录》, 《战后之暨南 (二十年度第二学期国立暨南大学一览)》, 国立暨南大学, 1932年, 第54页。

[30] 《南洋研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 《暨南校刊》第十期 (1932年4月11日), 第3页。

[31] 《暨大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一年来概况》, 《南洋情报》第二卷第三期 (1933年6月1日), 第121页。

[32] 《校长布告 (第一一七号)》, 《暨南校刊》第八十期 (1933年11月6日), 第1页。

[33] 《校长布告 (第一三〇号)》, 《暨南校刊》第八十四期 (1933年12月4日), 第2页。

[34] 《校长布告 (第七号)》, 《暨南校刊》第八十八期 (1934年2月26日), 第5页;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近讯》, 出处同, 第8页。

[35] 《校长布告 (第一二三号)》, 《暨南校刊》第一三六期 (1935年5月20日), 第3页。

[36] 《教育部令 (秘字第七八九号)》, 《暨南校刊》第一四二号 (1935年9月20日), 第1页。

[37] 《校长布告 (第七号)》, 《暨南校刊》第一四二

号 (1935年9月20日), 第4页。

[38] 《校长布告 (第十七号)》, 《暨南校刊》第一四二号 (1935年9月20日), 第10页。

[39] 《海外文化事业部暑期工作概况》, 《暨南校刊》第一七八号 (1936年9月7日), 第10页; 房鑫亮:《何炳松年谱》, 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四卷, 第772页。

[40] 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 正中书局, 1942年, 上册, 第61页;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研究馆筹备处 (民国二十七年第二学期) 进行计划”,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635 第95页。

[41] 《南洋研究馆要闻·南洋研究馆正式成立》, 《暨大要闻》海外版第二期 (1940年2月1日), 第7页; 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 第61页。

[42] 何炳松:《〈暨大校刊〉复刊辞》, 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 第二卷, 第708—709页。

[43] 何炳松:《〈暨大校刊〉复刊辞》, 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 第二卷, 第710页; 房鑫亮:《何炳松年谱》, 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 第四卷, 第820—821页; “国立暨南大学三十二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题名录”, 1944年1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597, 第44页。

[44] 马均权:《我的校长何炳松》, 《读书通讯》第一一七期 (1946年9月25日), 第16页。

[45] “国立暨南大学关于南洋研究馆改名为南洋研究所事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635 第120—13Q 137、139、141、143页。

[4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 (接文字第壹号)”,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225 第29页。

[47] 王延青:《征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18页。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 (军教字第一号)”,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225 第6页, 剪报; 王延青:《征程》, 第319—320页, 文字略异。

[49] “暨南大学简史”, 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立暨南大学档案 Q240-1-682 第8页。

[50] 王延青:《征程》, 第320页。

[51]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暨南校史 (1906—1996)》, 第111页; 王延青:《征程》, 第333页。

【责任编辑:王宣】